

西学东渐浪潮激荡下的思想脉动

——论汉语神学对中国个体主义哲学的影响

李跃红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西学东渐浪潮激荡下的思想脉动

——论汉语神学对中国个体主义哲学的影响

李跃红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宫 共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学东渐浪潮激荡下的思想脉动:论汉语神学对中国个体主义哲学的影响/

李跃红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01-017067-1

I. ①西… II. ①李… III. 神学-影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

IV. ①B972②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0975号

西学东渐浪潮激荡下的思想脉动

XIXUE DONGJIAN LANGCHAO JIDANG XIA DE SIXIANG MAIDONG

——论汉语神学对中国个体主义哲学的影响

李跃红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5.5 字数:355千字

ISBN 978-7-01-017067-1 定价:69.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自序

故乡是个知名的旅游地，引人注目之处甚多：终年的雪山，并行的河溪，石垒木架的民居，青瓦连片的古镇……我却留恋村中大石桥上的青石。据传此桥已有400年，青石起伏光滑，凹洼圆润，悬月下镀着银，斜阳中泛着金。这是多少代人来来往往的肌肤胼胝打磨出来的呢？青石的凹处竟然汇聚着如我此刻一般在上踱步往来的无以数计的生命存在，其中包括我的祖上，我的乡亲。而我却只知道有“他们”，就像笼统地知道有“人类”一样，而不知道“他”和“她”。更多时候人们连“他们”甚至连这青石也不知道，一切存在都不存在，只知赶忙过去，赶到那些要去忙碌的事务当中。此刻的我，也终将为此青石所遮蔽吗？甚而至于也终将不存在吗？

故乡背靠的丛山里散落着本地各家族的墓地。然而能看到的却是老旧的石块和碑上千篇一律的姓名年月。即使是我们家族墓地，除了我见过的几个上辈同辈，我仍然只知道有“他们”，而不知道“他”和“她”。石块及石块上（还有家谱上）的符号怎能负载那一个个如我此刻一般的心绪浩渺的生命存在呢？而且随着旅游业发展，建筑上移，许多家族墓地迁向更高更深之处。而现代都市的状况已然预示了它们终将消失的结局。

“我”于我而言便是全部世界全部生命全部的悲欢际遇所在。无数的“他”和“她”，也就是无数其他“我”的丰富却短暂的存在果真存在吗？我如何确信其存在？存在的最终根据又何在？

关注感性个体生命，可谓中国现代精神发轫时期的一个具有标识性的哲学思想，而其萌发则与清代后期开始的西学东渐浪潮有关。这里涉及西学东渐与中国现代哲学论题。以往相关研究主要限于通常意义上的“哲学”概念范围，比如“某种西方哲学在中国”等。然而，西学东渐内容远不止于哲学，同样，对于中国哲学性思想和问题的影响，也不应止于西方哲学。在这当中，由西方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思想传华而来的汉语神学对于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尤应值得关注。提出或者强调这一点当然不无原因。19世纪初开始的西学东来，新教汉语神学为其最初内容，而且通贯至今；西教士为其始作俑者，而且是整个晚清输入西学的重要力量，但这一切与中国哲学思想的关系却少有人问津。究其原因，或如一位相关学者在聊及自己不再做相关研究时所质疑的：汉语神学对中国哲学有影响吗？的确，在西学东渐浪起涛涌的清代后期和民国初期，汉语神学思想并未进入中国哲学思想主流。然而，这是否意味二者无涉呢？某一段精神的历史并不能代表精神的实质。从根本上说，宗教与哲学同被归于人文学科（而非科学），自然有其内在相通之处。即使就历史而言，宏观看去，佛、道二教对于中国哲学以及基督宗教对于西方哲学的影响，明显而重要。据此，汉语神学在西学东渐浪潮中未入中国哲学思想主流，本身便是应该研究的问题，更何况在中国当代思想学术领域，人文性汉语神学已然形成思潮。

研究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关系无疑是必要的，但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又是多方面的。结合在中国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基本特征，新教精神的质素，尤其是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发端和当代汉语神学的伸展，更尤其是笔者自身个体存在的体悟、需要和思考，本书将就西学东渐中汉语神学对于中国个体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展开论述。

本书研究与写作的内在缘由大致如此。

李跃红

2017年1月于丽江束河

目 录

自 序	1
绪 论	1
第一节 西学东渐：中国历史的全新阶段	1
第二节 终极关怀：哲学性问题中的生命底蕴	5
第三节 人生存在：宗教与哲学的重合之处	12
第四节 个体生命：现代哲学日渐凸显的论题	19
第五节 本书研究的论题、范围及基本概念	22
第一章 儒家思想与个体生命	31
第一节 儒家学说的生发点	31
第二节 儒家思想的根基	39
第三节 仁学分析	43
本章小结	50
第二章 基督新教中的个体本位论	53
第一节 希腊哲学	53
第二节 希伯来文明	58
第三节 《新约》时期	63
第四节 早期基督教	69

第五节 宗教改革与新教个人主义精神	73
本章小结	86
第三章 汉语神学：清代后期西学东渐的重要内容	88
第一节 清代后期西学东渐过程的内涵	88
一、西学“东来”与西学“吸纳”	88
二、西学东来：文化—人生（宗教）在先	90
第二节 新教传教士：西学东渐的先锋与主力	93
一、早期来华传教士：西学东渐的先锋	94
二、早期传教士报刊：西学东渐的滥觞	97
三、基督新教传教士：西学东渐的主力	99
第三节 清代后期新教传教士相关背景简析	103
一、宗教改革原则：新教徒应当理解的精神	103
二、个人敬虔与觉醒：新教振兴与宣教高潮的基础	105
第四节 以往关于晚清传教状况的论述	108
一、两种宣教模式	108
二、输入其他西学的根本原因	111
第五节 全面输入西学：被动与主动	113
一、“被动”输入西学其他内容	113
二、“主动”输入各种西学内容	116
第六节 清代后期西学东渐中的汉语神学	123
一、清代后期汉语神学的普泛性与丰富性	123
二、清代后期汉语神学的影响	127
本章小结	132
第四章 汉语神学未能进入晚清哲学及其原因	134
第一节 晚清汉语神学未能进入中国哲学	134
一、概念辨析与例证选择	134

二、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基督教的认识	136
三、中国哲学史论著中的汉语神学	140
第二节 个体自由：中学与西教失之交臂的论题	146
第三节 中国知识分子：晚清个体生命论题失落原因分析	
之一	150
一、接受西学的被迫性	150
二、传统文化的制约性	152
三、现代西学的分化性	155
第四节 新教传教士：晚清个体生命论题失落原因分析之二	158
一、基督新教神学与哲学	158
二、两种传教模式的不足	160
三、西教士知识结构的不足	166
第五节 晚清汉语神学对中国哲学作用端倪	173
一、政治宗教方面	174
二、哲学思想方面	176
三、个体主义方面	179
本章小结	183
第五章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中的汉语神学与中国哲学思想	186
第一节 西学东渐新浪潮与汉语神学	187
一、东来西学与汉语神学的疏离	187
二、晚清西学东渐与西方哲学	188
三、清末严复：西学东渐新阶段的开端	190
四、五四时期：西学东渐的高潮	194
五、五四时期西学东渐高潮中的孔教批判	196
第二节 西方哲学东渐与汉语神学边缘化	200
一、汉语神学边缘化现象	200
二、汉语神学边缘化原因分析	203

三、西方哲学东渐与“自由”思想	207
第三节 鲁迅个体主义精神特征与意义	218
第四节 个体主义质疑与梁漱溟人生论	230
一、关于清末民初个体主义的质疑	230
二、梁漱溟的回应	233
本章小结	236
第六章 陈独秀汉语神学及其哲学意义	238
第一节 陈独秀汉语神学的缘起与研究状况	239
一、陈独秀有无“汉语神学”?	239
二、陈独秀汉语神学的缘起	240
三、关于陈独秀基督教论的研究	242
第二节 陈独秀汉语神学发展三阶段	244
一、否定宗教	244
二、推崇耶稣	248
三、批判教会	250
第三节 陈独秀汉语神学特征	254
一、阶段性	255
二、时代性	255
三、统一性	258
四、分层性	259
第四节 陈独秀汉语神学性质、意义与影响	261
一、陈独秀汉语神学性质	261
二、陈独秀汉语神学意义	264
三、陈独秀汉语神学影响及教会神学的呼应	267
第五节 陈独秀汉语神学与现代个体主义哲学	269
一、陈独秀汉语神学人生论的形成	269
二、陈独秀汉语神学的个体生命特征	272

第六节 陈独秀汉语神学的根本性缺失	279
一、陈独秀汉语神学的道德化	279
二、儒教生命归宿的承担	280
三、陈独秀汉语神学的超越性缺失	282
本章小结	284
第七章 赵紫宸等汉语神学的个体主义要素及特征	286
第一节 中国教会及其汉语神学的兴起	287
第二节 “人格主义”分析	289
一、人格救国	289
二、人格主义神论	291
三、人格主义的目的在于社会	294
第三节 个体主义因素及其淡化	296
一、人格主义中的个体主义要素及其基点	296
二、个体主义的淡化	297
三、个体主义要素淡化的原因	299
本章小结	302
第八章 八十年代西学东渐与个体主义哲学	305
第一节 八十年代与五四时期现象比较	306
一、由“文艺”而“美学”而“文化”	307
二、西学东渐的重要影响	312
第二节 八十年代与五四时期根本相通之点	316
一、个体精神：五四精神的实质	316
二、五四时期文学与美学的内涵	317
三、八十年代文艺与美学的内涵	322
第三节 “文化热”中的个人主义及其困境	326
一、意识形态话语生发出的主体与个体思想的困境	326

二、“激进批判”的个人主义及其困境	331
三、“伯林式”的个人主义及其困境	335
第九章 当代汉语神学与个体主义突破困境的努力	339
第一节 西学东渐新阶段	339
一、汉语神学新阶段	340
二、哲学思想新阶段	341
第二节 当代汉语神学与人生哲学根基批判	342
一、“拯救”：新的批判立场	343
二、“逍遥”：以往人生哲学根基批判	345
第三节 当代汉语神学与个体主义根基建设	349
一、当代汉语神学萌发与形成时期	350
二、个体主义的重申与诠释，深化与发挥	353
第四节 西学东渐与当代个体主义汉语神学	357
一、古典新教神学吸纳	357
二、现代哲学与神学的吸纳	358
第五节 汉语学术神学面临的困难与应对方略	367
一、教会及其神学界的抵制	367
二、基础缺乏与植根学术建制的努力	370
三、宗教顾忌与公共神学引介	373
本章小结	378
结 语 故事尚未完结	380
参考文献	385
后 记	398

绪 论

第一节 西学东渐：中国历史的全新阶段

王国维尝曰：“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① 这里所谓“学术”，其实指的是哲学思想。^② 所谓“外界之势力”，乃指哲学思想及学术之外的政治等社会存在，但也可指外域势力的淹侵。而所谓“大哉”之“影响”，一个重要表现当是促进历史的自觉反思。比如，在西来佛学昌炽的冲击下，便有了韩愈、李翱直至朱熹等对于儒家“道统”的回省。^③ 晚清时期，“西学东渐”浪潮再次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反思历史，并呈现新的特色：一是具有世界眼光；二是历史划分理念发生变化。比如梁启超便批评传统的“以一朝为一史”，或是以王

①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载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6 页。

② 冯友兰曾指出，清末民初时期，一些人将“类似哲学史的著作称为学术史或思想史”，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自序”，载冯友兰著《三松堂全集》（第十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85 页。

③ 韩愈在《原道》中曰：“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8 页）李翱于《复性书》又于孔子后加颜回、子路、曾皙、子思，于孟子后加公孙丑、万章。朱熹则加上时人程颢、程颐等，作为孟子之后绝学继承者（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5 页）。

朝更迭作为“通鉴”断代依据的方法，指其“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也”，认为应“就其事变之著大而有影响于社会者”来作时代划分的依据。据此，他将整个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黄帝到统一的秦王朝，特点是中国民族自求发达并自相竞争和团结；第二阶段由秦到清代中期，特点是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频繁交流并激烈竞争；第三阶段由清中期到如今，特点是“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①

柳诒徵亦将中国历史分为三段，即“自邃古以迄两汉”，“自东汉以迄明季”，“自明季迄今日”。虽然具体分期与梁氏略有不同，但划分理由却类似，不过将第二期具体指为佛教传华并与中国既有文化碰撞并融合的时期。第三期则同样为“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②

周予同在总结中国思想文化时同样分为三大时期，第三期从明末到现在，也是“中国与西洋文化由接触而突变的时期”。在此基础上，周予同又“按照学术思想本身的演变”而“分为八个时期”，其中“第八期从清末到现在（二十世纪初），可称为西学渐盛时期”^③。吕思勉将中国学术分为七期，也认为第七期为“受诸欧美者也”的“现今所谓新学”。^④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则认为，漫长的中国历史只有两次社会大转变，第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个是从1840年开始的近代时期。而且，第二次大转变“比第一次大转变更剧烈，更迅速，范

①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12页。

②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绪论”第1—2页。韩钟文称：“柳诒徵将《中国文化史》分为三编，取义与梁启超相似。”见韩钟文《儒家与西方哲学研究》，载傅永聚、韩钟文主编《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总21卷，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页。

③ 周予同：《“汉学”与“宋学”》，载李绍强主编《儒家学派研究》，傅永聚、韩钟文主编《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总21卷，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页。

④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3页。

围也更广大”。^①

综上所述，结合本书内容，又可择出晚清时期反思并梳理历史的第三个特色，那便是无不将迄今未止的最后阶段归为中西激荡或西学东渐时期。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将西学东渐划为新的历史阶段的合理性。他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几个影响至今的普遍精神“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②。就这几个文明的相互交流而言，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即已开始接受印度佛教文化，并形成儒道释合流的文化大观；而希伯来与希腊也在两千年前即已开始交融，并形成了基督教文化。但是中国与西方精神之间，却一直无缘接触交汇。唐代虽有基督教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传入大秦景教（约635—845年），元代亦有罗马教廷使团传入也里可温教（约1293—1328年），但皆未成气候，且很快湮没不存，未留下影响。直至晚明，尤其是晚清时期。如果说佛教东来与“两希”交汇都产生了重要的精神成果，那么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势必形成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结果。

据梁启超历史划分理念，西学东渐实为“事变之著大而有影响于社会者”。其实，清末民初涌现对中国历史、文化及思想前所未有的宏观审视^③，原本就与西学东渐有密切关系。由是又可见，尽管现代西学（包括欧洲和后来的北美）之有效东传始于明末并赓续清初，但真正成浪成潮之势，却始自清代后期。如今人们论及那段历史，常用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自序”，载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页。另见第288页。

②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③ 以上所引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发表于1901年，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创稿于1919年”，参见蔡尚思《〈中国文化史〉导读》，载柳诒徵撰，蔡尚思导读《中国文化史》（上），第2页。周予同文晚一些，发表于1933年5月《中学生杂志》第35号。

李鸿章“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①之语。能激起“大变局”者，当然离不开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内容，但是其中就没有思想方面的因素吗？“学”之“渐”又岂能离得开思想文化内容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纠合了各种意义上的“外界之势力”，使中国思想学术开始发生不亚于国体更换的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文化更新本身，又不啻构成“大变局”的组成部分，而且使其影响邈远不绝，绵延至今。

哲学性或哲学层面的精神现象，可谓文化深层内容。细致分析，深入研究西学东渐中的中国现代哲学问题，无疑是当今学术所应有的担当。自清代后期西学东渐推涌成潮伊始，迄今已逾一个半世纪。其间西方哲学的输入及对中国哲学学科构成和传统思想研究的影响，广泛且显著。不宁唯是，对西方哲学东渐史的研究，也有了系统样式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尚比较多地表现为某类西方哲学在华状况研究。此类研究无疑为西方哲学东渐研究的一种典型样式，^②然而，西学东渐中的哲学问题，或者说西学东渐之于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影响，仅限于西方已有哲学理论、流派的介绍和研究吗？进而言之，哲学论题仅仅存在于已有的哲学体系当中吗？在以往的研究当中，还有哪些潜在的哲学性问题——尤其是因应现实需要的哲学性论题——尚未引起注意？这无疑应该成为当前“西学东渐与中国现代哲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

然而，哲学或者哲学性问题到底具有怎样的特点呢？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我们又应该关注哪些哲学性的问题呢？

① 李鸿章：《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曾多次在奏折中使用类似“变局”说。如梁启超在其《李鸿章传》第六章中，便引用了李鸿章在光绪元年（1875年）所上奏折《因台湾事变筹划海防折》中“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语。此说一出，广为流行。比如严复便曾道：“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待也。”见严复《论世变之亟》，载胡伟希选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② 比如富有代表性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汤一介主编）。该丛书凡14部，主要为专项研究，如“某种西方哲学在中国”。其门类之全，材料之丰赡，前所未有。

第二节 终极关怀：哲学性问题中的生命底蕴

哲学性问题无不以人的存在和生命底蕴为基础为前提，中西哲学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一、西方哲学

终极关怀或终极眷注，就字面而言，指向一切终极存在，包括世界发生的本源，现象背后的本质，万物存在的依据，也包括认识发生的原因，心与物的关系，知识合理性的标准，还包括划定认知疆界、模塑知识样式、分析存在基础的语言的根本特质等。对这些终极问题的追问探寻，也就是“关怀”“眷注”，便是哲学。以上三类问题的思考分别大致构成了西方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和 20 世纪的语言论哲学。显而易见，在哲学中，除“终极”问题而外，还有“人”对此类问题的“关怀”和“眷注”。哲学发展至今，人们已然普遍认为，若无人的“关怀”，感性世界无从得见的“终极”便无从显现。在牖陈了哲学领域中的一系列论题之后，罗素（Bertrand Russell）设问道：为何要在这些“在实验室里找不到答案的”，或者说在现象界看不见摸不着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上虚耗光阴呢？他的回答是，对此既可以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来作答，也可以站在一个有限存在的，“面临着宇宙孤寂的恐怖感的”个体生命的角度来作答。^①而在此无论站在什么角度，以什么身份去作答，显然都与人对自身的关注分不开。正因此，人的问题在哲学演进史上成为日益彰显的问题。

早在作为西方哲学发生阶段的希腊哲学中，哲学家们便注意到人

① [英]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2 页。

的问题。以本体论为特色的希腊哲学始于自然哲学，但很快便转向人类生命、人类精神乃至人的个体本身，致使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和诗学等纷纷兴起，“至善”及“人生的目的和目标”等，成为人们至为关注的问题。^①正是由于具有人文主义性质，方才形成了苏格拉底（Socrates），尤其是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内容丰富的系统哲学理论。及至认识论阶段，哲学集中思考人的认识如何可能或知识如何有效问题。关于人的认识能力的考察，除了科学而外，还涉及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和艺术审美等所有人文社会学科内容。毫无疑问，此时的哲学与人的联系更为紧密。而一些重要的哲学家，如康德（Immanuel Kant），将人的理想价值作为其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理逻辑哲学和索绪尔语言学的研究，表明思维和语言密不可分，于是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向，便是从以往对认识能力的研究转向对形态明确的语言的研究。以人所专有的语言作为研究中心，使得哲学与人关系更为切近。另外，便如哲学史家梯利（Frank Thilly）所言，政治学、伦理学和美学等在欧洲哲学发展初期，便为哲学研究内容，因此，善与恶，幸福与痛苦，以及人生意义等，便同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论诸问题一起，成为西方哲学关注的终极性内容，并且彼此结合，形成关于自然与社会发展目标讨论的目的论哲学。当代与“语言论哲学”并起并行并也同样注重语言的“存在论哲学”，更直接以人的存在作为哲学的基点与核心，据此探讨人的生命性质与世界意义。

以上关于西方哲学初始阶段即有的特质和后来整个演进趋势的简要勾勒，表明哲学的终极关怀，一般或广义而言就是超越感性世界之有限，追寻现象之后或之中的永恒，但从根本或狭义来说，“终极关怀”不仅与人的存在紧密相连，而且集中于人之具体生存境遇的整体性反思，尤其是对超越感性生命的有限，追寻人生本源、存在依据，

^① [美] 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8页。